

路径依赖理论视阈下的中国竞技体育体制

冯晓丽

(山西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0)

摘 要: 用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对中国竞技体育体制的运行机理进行了解析, 分析了中国竞技体育体制存在的路径依赖负效应, 并从加强竞技体育体制的理论研究、加快构建与完善体育法制、引导各利益主体回归以民族凝聚力为核心的价值理性、充分尊重各主体的利益走渐进式多元化和制度变迁道路等方面, 就如何形成路径超越进行了探讨。

关 键 词: 体育管理学; 中国竞技体育体制; 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0)08-0007-04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ath dependence theory

FENG Xiao-l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0,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path dependence theory by Douglass C. North, the author dissected the running mechanism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in China, analyze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path dependence existing in the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in China, and probed into how to form path crossing over in terms of 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sports, guiding various main bodies of interests to return to the value rationality that bases its core on national cohesion, fully respecting the interests of various main bodies, and going the way to change the system in a gradually developed, multi-element involved and socialized way.

Key words: science of sport administration;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in China; path dependence

中国竞技体育体制作为存在了 60 年的一种实践制度, 在北京奥运会结束后, 其产生必然性、存在合理性及其改革的前景等问题尤显突出。本文面对历史, 面向现实, 在历史与现实的经验考察中, 试图用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去衡量中国竞技体育体制的成败得失, 进而察悟其发展走向。

1 路径依赖理论对中国竞技体育体制的理论解析

1.1 路径依赖理论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路径依赖是指制度在变迁的过程中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 这种机制一旦形成,

不管是否有效, 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选择, 就会使制度变迁依据其初始条件沿着某一特定的路径承袭下去。诺斯认为,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有两种极端形式, 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 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 即正效应; 一是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 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 即负效应^{[1]474}。

路径依赖理论从两个方面满足了中国竞技体育体制变革的实际需求: 一是路径依赖理论的思考范式和分析方法说明, 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代替效率较低的旧制度的转型过程中, 多种因素制约着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实践。二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 渐进式改革道

收稿日期: 2009-12-27

基金项目: 2006 年山西师范大学哲社重点课题(YS06005)。

作者简介: 冯晓丽 (1972-), 女, 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人文社会学。

路充满复杂性,需要引入复杂、非线性的分析方法进行客观的研究,才能对中国竞技体育体制实践具有更强的揭示与分析。

中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结果依赖于制度的历史发展。一个初始性制度安排往往会影响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变迁的过程更会严重影响制度的选择和超越。诺斯^[2]告诉我们,历史是最重要的,因为“路径依赖的研究主题就是过去的历史是如何和现在、将来相联系的。路径依赖与其说是一种‘惯性’,还不如说是过去的历史经验施加给现在的选择的约束。要想理解变迁过程,就必须理解路径依赖的本质,以确定在各种环境中路径依赖对变迁所施加的限制的本质。”

1.2 路径依赖理论下中国竞技体育体制的运行机理

制度的“路径依赖”运行机理可以概括为给定条件、启动机制、形成状态、退出闭锁 4 个过程。

建国初期,新中国在“延安模式”的引导下、在“苏联模式”的效应下,选择竞技体育体制是大多数人对前景充满希望的体现,积贫积弱的国家现实状况就是中国竞技体育体制形成路径依赖的初始给定条件,并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路径依赖槽。我们看到,这种体制力图追求体育强国与实现人民体质的增长。竞技体育体制的制度安排达到了这一目的,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在虎狼环伺的国际环境中,竞技体育体制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极大激励了全国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向全世界表现了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由此形成了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路径依赖槽。一个国家或社会,起初制定的制度选择或制度安排必定会深刻影响以后的制度变迁。正如儒家思想制度自从被汉代统治阶级顶礼膜拜后,虽然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经历了多次的换代改朝,虽然出现蒙古族、女真族等少数民族数百年统治中原的情况,但起初制定和执行的儒家思想制度仍然对中国 2000 多年的制度变迁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不为个人所控制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竞技体育体制同样遵循这个规律。

1978 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提出了侧重发展竞技体育、瞄准奥运会的工作思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同时,使得竞技体育体制路径依赖运行过程的“启动机制”和“形成状态”开始建立。“启动机制”指系统中的正反馈机制随给定条件的成立而启动,“形成状态”指正反馈机制的运行使系统出现某种状态或结果。奥运金牌的正反馈机制是其启动并形成路径依赖的关键因素。金牌数量和金牌本身已经超出体育自身的价值范围,而成为了

中华民族重塑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的重要精神平台,其在国民心中形成的正反馈机制使得竞技体育体制的运行产生了高效率。虽然 1988 年兵败汉城,但竞技体育体制并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1995 年,国家制定了《奥运争光计划纲要》,2000 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悉尼奥运会上取得的优异成绩再一次使得竞技体育体制正反馈机制获得了递增收益,从而竞技体育体制进一步得到巩固。正是如此使得竞技体育体制的路径依赖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决定于报酬递增、不完全市场、交易费用、利益等 4 个因素^[1475]。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坚持与完善,首先依赖于数次奥运会金牌数量和世界排名的不断提升,带来了报酬递增效应;其次不完全市场告诉我们,人们不可能事先掌握准确而又全面的信息,制度变迁不可能总是按照初始设计的方向前进,尽管 1993 年《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已经要求国家一级机构直接管理运动项目过渡到由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管理,但由于高额的交易费用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使得竞技体育制度陷入“锁定”状态。

2 中国竞技体育体制的路径依赖负效应

60 年来,竞技体育体制使得我国运动技术水平收益递增,在世界大赛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发展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令世界刮目相看,助成了极具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增强了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尤其是北京奥运会的成绩连西方都为中国的竞技体育体制惊叹不已,纷纷效仿。

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在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方面,我们所采用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路径。但这种具体体制的制度安排所暴露的矛盾,使它在新条件下不能进一步满足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导致路径闭锁并产生了路径依赖的负效应。

1)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发展失调。

公共经济学根据产品的特征将其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产品性质决定了产品的生产费用由谁提供的问题。公共产品就是在消费上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公共产品又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指的是严格满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其生产费用完全由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可以说是同时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和私人产品性质的产品,包括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却可以轻易排他的产品和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但却无法有效排他的共同资源,其生产成本由政府 and 受益的企业或个人共同分担。

从产品属性上讲，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学校体育作为现代体育的3个最基本组成部分，都是准公共产品，其生产费用都应由政府和社会共同负担。目前，竞技体育实行“举国体制”，政府将竞技体育作为公共产品来看待，举全国之力发展竞技体育，高水平竞技运动成为国家的重点，从业余训练到专业训练都得到了强化，资源配置严重倾斜，国家政策、资金大多流向“金牌战略”、“奥运战略”。“虽然体育决策部门也曾经提出要‘一手抓竞技，一手抓群体’，但是事与愿违，经常是一手硬、一手软，‘软任务’常让位于‘硬任务’……这就是体制上‘一头沉’造成的恶果”^[3]，从而使得学校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迟缓。

2)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方向明确，但预期目标还很模糊，“划桨”与“掌舵”不分。

1993年以来的文件都将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方向确定为“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竞技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但是具体改革实践中，目标却很是模糊。近年的改革实践中，行政职能以多种“变脸”的方式存在于调整后的机构中。“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各项目管理中心本身兼具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双重性质，同时又具有部分行政职能，导致协会管理仍然有名无实。体育职业化改革是最具突破性体制改革，虽然足、篮、排、乒等项目组建了多种类型的俱乐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职业联赛，具有了职业化的基本特点，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化体制和运行机制并未形成。

“划桨”与“掌舵”不分，严重地束缚了各利益相关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也极大地阻碍了竞技体育社会化的进程，与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距甚远，也无法满足人们对体育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

3 中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路径超越

1) 加强竞技体育体制的理论研究，明确改革目标，指引举国体制的超越与完善。

胡锦涛主席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举国体制在北京奥运会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出了积极挖掘潜力、优化结构、提高效益，推动竞技体育内部各门类均衡发展，进一步继续完善竞技体育体制，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创新体育发展体制的要求。

目前，我国竞技体育成长的体制采用的是“金字塔”式三级训练举国体制。但是综观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研究，对于塔基的组成、塔尖的高低判别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这就使得我们对于竞技体育体制模

型的成长缺乏较为理性的认识^[4]。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加强“以人为本”的竞技体育体制的理论研究，打破认知锁定，创新竞技体育体制的理念，以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才能明确竞技体育发展的目标。体育制度创新需要体育思想的创新，需要体育理论的创新，需要体育手段和方法的创新，更需要实际的创新行动，所有这些创新对体育人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高水平竞技运动科学发展的中心也是人，因而我们要在“人”字上做好文章。竞技体育要发展，最终要靠从事体育的人来完成，对人的知识加强管理，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知识创新，进而实现体制创新，这既是包括竞技体育运动在内的发展追求的目标，也是体制变革的最高目标，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源泉。

2) 加快构建与完善体育法制，引入外生变量，依法推动竞技体育体制改革。

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制度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就变得十分困难，要改变这种状态，往往要借助于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来实现路径替代。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就要靠各主体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并使这些权利义务有序地实施运行，即要靠合理的体制及其运行。法律规定表现为明确各个主体参与解决问题的权利、为解决问题而必须履行的义务，并规定各个主体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程序，也就是建构有效运行的体制，并由此形成社会法律关系。社会法律关系的运行，各主体权利义务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冲突和衔接，就构成了社会体制。后奥运时代，我国体育的改革与发展，必然要求弘扬光大法治奥运的理念与精神，必定形成对体育法治更加紧密的制度依赖。现代法治在推动我国迈向体育强国的奋进中是必不可少的外生变量。目前，我国体育法治在体育立法和实施方面存在滞后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于1995年颁布实施，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立法思路的局限，与当前体育改革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明显，在实施中，全国各地在体育行政执法检查监督方面的权力与范围十分有限，尚未形成一定制度体系^[5]。总之，目前的体育法治对于竞技体育体制的改革推动作用不够，不能适应建设体育强国的发展要求。

3) 引导各利益主体回归以民族凝聚力为核心的价值理性，构建政策支持联盟。

文化为民族之根、体制之母。同时，民族的思想文化对于国家与民族的崛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

如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讲：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我们各民族在长期交流融合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秩序、社会体系方面的聚合力，是民族共同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从最高层次上说，是团结、维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伟大精神和物质力量^[6]。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著名哲学家、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第一点就是刚健有为。追求崇高的人格精神与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是民族凝聚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这种内化的精神要素使得运动员在竞技场上产生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而尽最大努力创造佳绩。因此，民族凝聚力可以说是我国举国体制产生和延续的重要文化因子^[7]。制定、实施任何公共政策都需要政策联盟的支持，而构成政策联盟的3个必备条件是：“基本的共同的‘政策信仰’、隐形或显性的共同利益、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联系”^[8]。只有让竞技体育中的各利益主体回归到以民族凝聚力为核心的价值理性中，才能处理好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追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构建政策支持联盟。

4)以市场为先导，充分尊重各主体的利益，走渐进式多元化和社会化的制度变迁道路。

历史决定了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体制必然是举国体制，举国体制的制度变迁必然是渐进式的而不会是激进式的，但举国体制的完善必须要以市场为先导。竞技体育的权力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体育协会、项目管理中心、运动员、教练员等。在坚持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下，真正变“划桨型政府”为“掌舵型政府”，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充分尊重各主体的利益，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一个和谐社会的体育必

须选择一条多元化的发展道路，竞技体育多元化的操作性概念是它的社会化。竞技体育本身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化丛林，运动项目多元化、运动主体的复杂化、运动员成才道路的个性化、运动目标的分层化。运动训练体制要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有能力、有魄力的单位开展运动训练。运动竞赛体制要建立一种公平竞争的机制，逐步完成长期集训制向竞赛选拔制的过渡，逐步完成向社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多元体制的转换。管理体制要走协会实体化的道路^[9]。

参考文献：

- [1] 卢现祥，朱巧玲. 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 道格拉斯·C·诺斯. 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9.
- [3] 熊斗寅. 熊斗寅文选[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 [4] 顾季青，田麦久. 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模型成长现状与对策[J]. 体育文化导刊，2007(5)：6-8.
- [5] 于善旭. 迈向体育强国的法治需求与挑战[J]. 体育学刊，2009，16(8)：1-8.
- [6] 王克千. 民族凝聚力与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J].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3)：98-106.
- [7] 彭雪涵. 文化视野中的中美竞技体育体制比较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4)：443-445.
- [8] 陈学飞. 理想导向性的政策制定——“985工程”政策过程分析[J]. 教育发展研究，2006(3)：83-84.
- [9] 卢元镇. 中国体育文化忧思录[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5-6.